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N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印度从辛格政府到莫迪政府的军购行为变化及其原因探析*

郑　华**　任姗姗***　张頔赟****

【内容提要】 军购是关乎主权国家军力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直接影响国防安全和国家间关系的亲疏远近。作为南亚强国，印度始终将海外军购作为提升自身军事实力及实现政治大国梦想的重要路径。从2004年辛格主政到2019年莫迪第一任期结束的十五年间，印度在经济实力上升、安全威胁增加、领导人实现政治大国意愿更为强烈的背景下，海外军购却呈明显下降趋势。本文分析十五年来印度国防战略、国内政治和国际环境三个维度的变化发现，印度军工产业的发展理念、军购数量及内容和来源国、执政党理念和领导人执政风格等是造成莫迪政府减少海外军购的主要原因。这些因素综合构建了印度国防自主化发展的态势、官僚机构的腐败和军工复合体集团的利益纠结。此间，国际形势经历了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以及从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印太战略”的变化。伴随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莫迪政府拓展印度政治影响力的初衷与美国政府试图借助印度制衡中国崛起的图谋相呼应，印度将军购作为其重要外交工具选择的趋势日益明显。

【关 键 词】 印度　军购　辛格政府　莫迪政府　中美战略竞争

DOI：10.16608/j.cnki.nyyj.2022.04.02

军贸作为关乎主权国家军力发展和实力增强的重要议题，是国际安全领域的重要选题。印度作为传统军购大国，历任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军事实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项目批准号：21VGQ003）的阶段性成果。

**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本科生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N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I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力建设，并将此作为实现大国政治梦想的重要支柱，以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重要的影响力。近年来，印度的军购规模和数量出现了逐步减少的趋势。从经济发展水平看，自 2004 年辛格执政以来印度经济实力持续上升，GDP 世界排名从 2004 年辛格政府初期的第 12 名升至 2014 年莫迪政府初期的第 5 名，[①]雄厚的经济实力赋予印度进一步扩大军购规模的可行性。从外部威胁情况看，因中印边境对峙事件增多引发的边界冲突的威胁上升：2013 年 5 月，在中印边界西段发生了长达 20 多天的“帐篷对峙”；2014 年 9 月，在边界西段发生了规模更大的对峙事件；2017 年发生长达 72 天的洞朗对峙；[②] 2020 年 6 月发生造成双方人员伤亡的加勒万河谷冲突。这些事件的发生使得印度认为扩大军购、提高军力的必要性陡然提升。此外，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背景下，印度将军购作为其重要外交工具选择的趋势愈发明显。相较于辛格政府“务实”、“保守”的外交理念，莫迪政府更重视国防实力建设，[③] 行事风格更为强势，但莫迪政府执政以来的海外军购数量却呈现下降趋势（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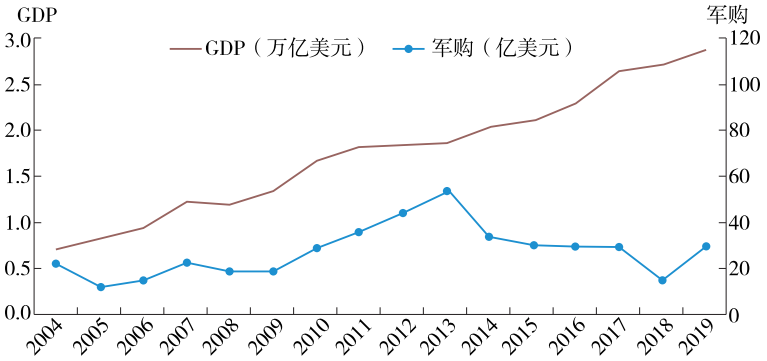


图 1　印度 2004～2019 年间的 GDP 与军购变化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相关数据自制。https：//www. sipri. org/databases

印度经济实力增强、自我感知外部威胁上升、领导人实现政治大国梦想的决心更为坚定且将军购作为重要外交工具，在这种背景下为何印度海

① World Bank Open Data. https：//data. worldbank. org/

② 林民旺：《十八大以来的中印关系：发展与挑战》，《中国周边外交学刊》，2017 年第 2 期，第 96 页。

③ 王晓文：《印度莫迪政府的大国战略评析》，《现代国际关系》，2017 年第 5 期，第 39 页。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I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N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外军购数量却出现减少？目前，学界关于军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军购内容、对象、时间、数量和监管等方面。[①] 此外，有些学者则将军贸作为一种外交手段，审视政治博弈、政治政策与军贸之间的关系，研究全球层次的武器贸易网络的演变，并认为其可为国家外交政策服务。[②] 在实证研究层面，现存研究成果多聚焦于大国军售，尤其是研究美国的军售行为，[③] 而对军购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且多聚焦军购之后的影响。[④] 其中，对印度军购行为的研究多是将其作为印度军力发展的路径之一，描述性分析其军购现状与利弊。[⑤] 总体上看，既有文献并不能解释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军购行为的变化。为此，本文将从印度国防战略、军工产业理念、领导人执政风格和外交取向等维度，综合剖析印度军购行为的变化。

① Keith Hartley，“The Arms Industry，Procurement and Industrial Policies，” *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No. 2，2007，pp. 1139-1176.

② Anders Akerman and Anna Larsson Seim，“The Global Arms Trade Network 1950-2007，”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Vol. 42，No. 3，2014，pp. 535-551.

③ Micheal T. Klare，*American Arms Supermarket*（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14）；Rachel Stohl and Suzette Grillot，*The International Arms Trad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9）；Keith Krause，*Arms and the State：Patterns of Military Production and Trad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漆海霞、周建仁：《军售与美国亚太地区战略布局》，《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 5 期，第 145～163 页；赵毅：《当前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探析》，《东南亚研究》，2014 年第 5 期，第 59～64 页；时殷弘：《东亚军备控制和不扩散问题：现状与危险》，《战略与管理》，2002 年第 5 期，第 29～33 页。

④ Paul Levine and Ron Smith，“The Arms Trade and the Stability of Regional Arms Races，”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Vol. 21，Issues 2-3，1997，pp. 631-654；Gregory S. Sanjian，“Arms Transfers，Military Balances，and Interstate Relations：Modeling Power Balance Versus Power Transition Linkag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 47，Issue 6，2003，pp. 711-727.

⑤ Kurian Alphonsa and Justine George，“Defense Import and External Sector of India，” *Journal of Defence Management*，Vol. 5，Issue 2，2015，p. 135；Harsh V. Pant and Ambuj Sahu，“Israel’s Arms Sales to India：Bedrock of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Special Report，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2019，https：//docslib. org/doc/13535219/israels-arms-sales-to-india-bedrock-of-a-strategic-partnership-orf-issue-brief-no；万伟：《印度大力推进军事变革》，《现代国际关系》，2004 年第 10 期，第 13～16 页；仲光友：《印度正在走向“世界军事大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2 年第 3 期，第 63～66 页；唐健：《印度加大军购影响地区局势》，《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 年 12 月 26 日，第 8 版；陈森林：《印度对外军购研究》，华中师范大学 2014 年硕士论文。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N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I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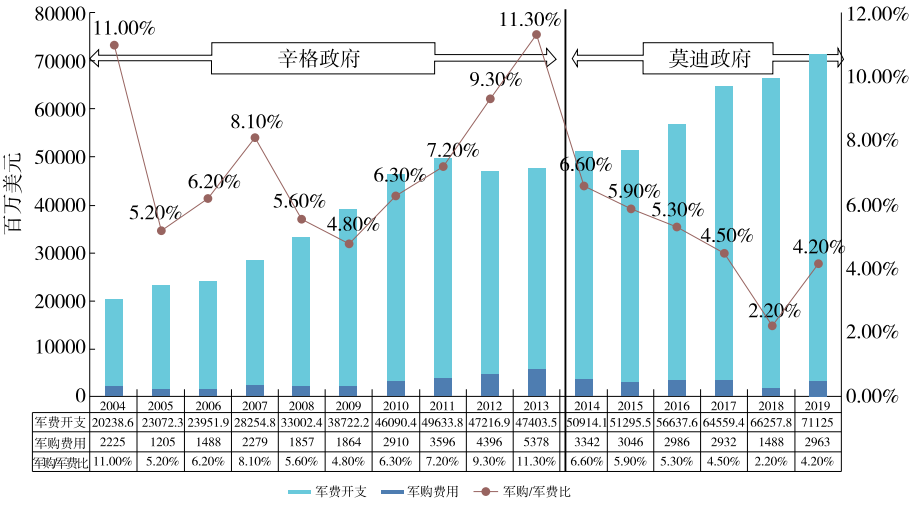
一、印度军购变化情况分析

印度军购行为变化可以直观地从其军购数据中分析得出。通过数据分析可知，与辛格政府时期相比，莫迪政府减少了军购投入，但其军购来源则变得更加多元，同时其军购类型也有相应调整。

（一）军购费用削减

与辛格政府时期（2004 年～2014 年）相比，莫迪政府为军购提供的军费支出更少。辛格政府的军购总额十年间持续增加，每年用于武器采购的费用约占军费开支的 5%～11%，十年间的军购总支出高达 270 多亿美元。在辛格第一任期内，印度的军购总额呈现波动增长态势，五年内共购买了价值 90.5 亿美元的装备。而在辛格政府第二任期时，军购支出便呈现快速攀升的趋势（平均增速为 31%），共完成 180 多亿美元的武器采购（见图 2）。

莫迪政府的军购总额呈现不断下降态势。在莫迪政府第一任期内，印度每年的军费开支逐年稳定增长，然而用于海外军购的费用却逐年减少。从数据上看，印度每年用于武器采购的费用仅占其军费开支的 2%～6%，五年间军购总支出约为 168 亿美元。到莫迪第一任期届满时，印度军购数量已滑落到十年前的水平（见图 2）。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军费开支	20238.6	23072.3	23951.9	28254.8	33002.4	38722.2	46090.4	49633.8	47216.9	47403.5	50914.1	51295.5	56637.6	64559.4	66257.8	71125
军购费用	2225	1205	1488	2279	1857	1864	2910	3596	4396	5378	3342	3046	2986	2932	1488	2963
军购/军费比	11.00%	5.20%	6.20%	8.10%	5.60%	4.80%	6.30%	7.20%	9.30%	11.30%	6.60%	5.90%	5.30%	4.50%	2.20%	4.20%

图 2　印度对外军购数量变化（2004～2019）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相关数据绘制。https：//www. sipri. org/databas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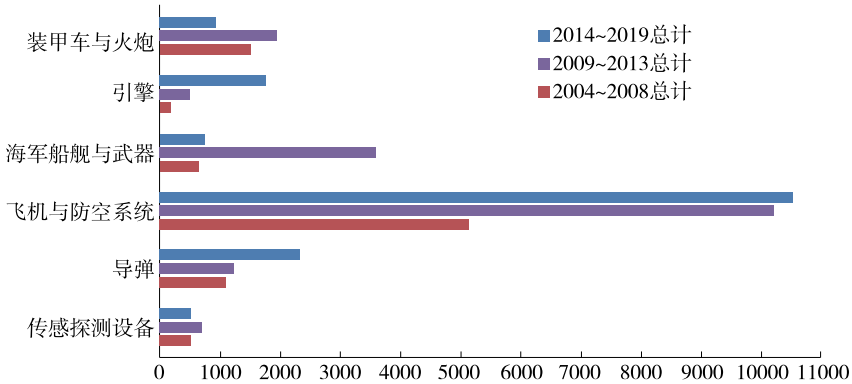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I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N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二）军购类型调整

莫迪政府的军购数量虽少于辛格政府时期，但军购质量则优于辛格政府时期。在辛格主政的第一任期内，印度每年的军购数额围绕 20 亿美元上下波动，五年总额达 90 多亿美元（见图 2）。在辛格的第二任期内，印度不同军种的军购比重与上一个五年相比的突出变化是：空军和海军装备有了巨大的飞跃式增长，其中空军购买各类飞机和防空系统的资金投入增加了近一倍，而海军在船舰与武器的购买费用上则增加了近五倍（见图 3）。

莫迪政府第一任期内，印度进口的武器装备品类一定程度上与辛格政府时期是相同的，所以莫迪政府没有再进行相同或相似武器的大规模采买。莫迪执政以来，因为军购开支的削减，印度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军火订单比前五年有所下降，新军购订单的数量较少也是造成该时期印度军购数量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莫迪政府引入的武器装备技术先进、性能优良，例如加大了对空军装备和大量高精尖导弹的引入，这些装备的作战能力明显高于辛格政府时期的军购装备，这主要得益于莫迪政府加大了对美国和法国等先进武器的进口（见图 3）。



	传感探测设备	导弹	飞机与防空系统	海军船舰与武器	引擎	装甲车与火炮
2014~2019总计	515	2337	10506	730	1755	914
2009~2013总计	688	1229	10192	3587	501	1947
2004~2008总计	531	1088	5135	626	153	1501

图 3　印度对外军购数量变化（2004～2019）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相关数据绘制。https：//www. sipri. org/databases

（三）军购来源多元化

辛格政府时期，印度军购布局中来自俄罗斯、美国、以色列和欧洲地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N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N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区的军备比重大致是 15∶1∶1∶2，印度军购来源较为单一，俄式装备占绝对主导地位，这也使印度对俄罗斯军备有着严重的依赖性。莫迪政府军购布局呈现多元化发展，逐步减少对俄罗斯的武器进口，将份额分摊给其他国家，尤其是扩大了对美国军备的采购。莫迪政府军购将俄罗斯、美国、以色列和欧洲地区所占的比重逐渐向 3∶1∶1∶1 优化，不断优化军购来源结构，加快降低对俄罗斯的依赖程度（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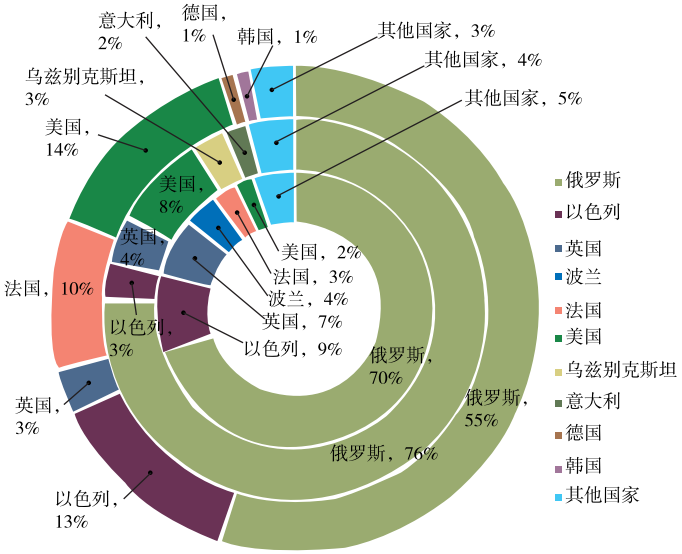


图 4　印度军购来源（2004～2019）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相关数据绘制。https：//www. sipri. org/databases

二、印度军购行为变化的内生驱动因素

长期的海外军购增强了印度的军事实力，但印度经济稳步发展以及日益增加的战略资源促使印度重新审视并调整国防战略理念，开始强化国防本土化发展趋势。同时，辛格总理和莫迪总理执政风格的不同也是印度军购行为变化的内驱动力。

（一）印度国防战略理念的变化

自 2004 年辛格主政至莫迪第一任期，印度国防战略理念从区域防御变为拓展全球影响力，军事布局从国内防御发展到海外拓展，作战理念从以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N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N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陆军为主转向多军种协同体系化发展。

在辛格执政初期，印度国防部发布的年度防务报告显示：其国防安全战略关注本土与周边地区安全，既有对“9·11”事件以来周边地区恐怖主义活动的担忧，也有对中国崛起的隐忧，[①] 其国防目标为利用军事力量支撑和平外交，[②] 实施捍卫本土和周边安全的国防政策。但到了2010年辛格第二任期伊始，印度国防战略出现变化：印度军方在保持对周边恐怖主义重点关注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多边机构活动，并深化与战略合作伙伴的互动，[③] 这主要体现在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进行联合军演。报告中首次出现了“东向政策”（LEP），试图将影响力进一步投射至东亚和东南亚地区。[④]

2014年开始的莫迪政府第一任期，印度国防战略关注亚太地区的力量调整。[⑤] 伴随中印边界对峙事件增多，印度多次提及针对中国的部队调动、双边磋商、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行动。此外，莫迪政府还寻求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成为美国2017年倡导的“印太战略”的重要成员。[⑥] 同时，印度通过国际维和、对外军售、国际组织等渠道加强其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其国防战略整体上更为激进。

激进的国防战略更加印证了印度近年来对确保自身国家安全和实现政治大国地位的强烈诉求，印度进而对国家军事力量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地区大国，印度已不愿再囿于凭借军购提升自身军事实力，不满足于将自身国防力量倚赖于其他国家。2013年，在印度议会联邦院就战备状态进行

---

① Ministry of Defence, Government of India, “Annual Report of Indian Ministry of Defence, 2004-2005,” pp. 8-14. https://www.mod.gov.in/sites/default/files/MOD-English2005_0.pdf

② Ministry of Defence, Government of India, “Annual Report of Indian Ministry of Defence, 2005-2006,” p. 2. https://www.mod.gov.in/sites/default/files/MOD-English2006%20%281%29.pdf

③ Ministry of Defence, Government of India, “Annual Report of Indian Ministry of Defence, 2011-2012,” pp. 2-8. https://www.mod.gov.in/sites/default/files/AR1112.pdf

④ Ministry of Defence, Government of India, “Annual Report of Indian Ministry of Defence, 2009-2010,” pp. 4-7. https://www.mod.gov.in/sites/default/files/AR910.pdf

⑤ Ministry of Defence, Government of India, “Annual Report of Indian Ministry of Defence, 2013-2014,” pp. 3-5. https://www.mod.gov.in/sites/default/files/AR1314.pdf

⑥ Harsh V. Pant and Yogesh Joshi, “Indo-US Relations under Modi: The Strategic Logic Underlying the Embra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3, No. 1, 2017, p. 141; Ministry of Defence, Government of India, “Annual Report of Indian Ministry of Defence, 2017-2018,” pp. 164-173. https://www.mod.gov.in/sites/default/files/AR1718.pdf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N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N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辩论时，国会议员、监管机构、政策制定者和国防分析人士均表达了他们对当前无法实现自身国防需求以及严重依赖他国的战略脆弱性的担忧，[①] 因此对印度来说加快国防本土化进程已刻不容缓。

（二）印度加快国防本土化进程的发展趋势

印度国防工业起步晚，底子薄，主要由国有企业构成。经过多年的发展，到辛格政府时期，印度已建成较为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形成了以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39家兵工厂、8家国防公共企业单位为主体的国防工业能力布局。[②] 然而，尽管许多印度军工集团已有数十年历史，但其经营范围仍然局限于大规模从国外进口武器装备或零件后自行进行组装、维护等基础工作，自主设计生产水平相对低下。总体而言，印度的国防工业尚不发达，主要表现在规模不大，技术水平不高，更没有先进武器装备生产的技术和能力。[③] 因此，辛格政府向海外扩大各类军备进口，积极引进生产线，一方面在武器出口商的授权之下进行生产仿制，一方面与国外相关军工企业和研究机构进行联合研发，以求拓展自身军备规模，增强军事实力。以印度最主要的军工集团印度斯坦航空公司（HAL）为例，该企业成立于二战期间，最初以生产美国莱特公司（Curtiss Wright）的战斗机起家，后于1963年被完全收归国有，成为印度最主要的军用飞机生产厂商，对印度的国防工业至关重要。[④] 印度斯坦航空公司曾一方面从俄罗斯进口并引进苏-30MKI先进战斗机的生产线，另一方面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开始国产光辉战斗机（LCA）的研发生产进程。然而，光辉战斗机并未达到印度军方和公众的期望，尽管其自主研发光辉战斗机的计划启动于冷战前，但直到2021年仅交付军方24架，且其性能已落后于战斗机发展水平一至两代。同

① Rajya Sabha，225th Session，Uncorrected Debates，May 8，2013. https：//rajyasabha.nic.in/Debates/VerbatimDebates

② 薛亚波：《印度推动国防工业开放的新举措》，《国防科技工业》，2007年第7期，第65～67页。

③ Richard A. Bitzinger，“The Indian Defence Industry，” in Rajesh Basrur，Ajaya Kumar Das and Manjeet Singh Pardesi eds.，*Indi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Challenges and Prospects*（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p. 117-139.

④ 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官网。https：//hal-india.co.i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N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N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时，尽管号称“自主研发生产”，但其整机国产率仅为60%，[①] 大部分导弹、雷达、航电等尖端技术仍然依赖进口，完全无法满足印度海空军对战斗机的需求。由此可以看出，自身生产能力低下和武器生产依靠“进口—仿制”，成为辛格政府时期军购规模庞大的重要原因，印度国防技术装备本土化可谓任重而道远。至莫迪执政第一任期，加快推进国防本土化进程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主要是受莫迪更为激进的工业自主化理念影响。对于什么是本土化，印度学者给出了答案，即“利用我们自己的技能和资源提升在国内设计、开发和制造设备的能力，就构成了本土化，什么都不依赖外国供应商，使我们自给自足。”[②] 莫迪总理在2014年上任伊始便发起了名为“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的运动，[③] 旨在鼓励公司开发、制造和组装印度制造的产品，并激励对制造业的专门投资，[④] 其中发展本土军工产业是该运动的重要一环。莫迪于2016年改革了2002年启动《国防采购程序》（DPP），将重点放在本土设计、开发和制造的武器系统上，并最终在国防制造领域走向自力更生。2020年，DPP被新的《国防收购程序》（DAP）替代，DAP进一步提升了国防采购中印度国产武器装备的占比，同时设备备件和维护修理的全部或部分制造程序必须由外国投资者的印度子公司承担。[⑤] 此外，印度逐步建设两条“国防工业走廊”（Defense Industrial Corridors），以提升国防工业发展水平。[⑥] 在国际合作方面，印度积极拓展军工合作渠道，努力带动本国武器装备生产和技术能力的提高。

---

① “India Approves Rs 48，000 Crore to Procure 83 Indigenously-developed LCA Tejas for the IAF，” *Economic Times*，January 15，2021. https：//economictimes. indiatimes. com/news/defence/india-approves-rs-48000-crore-to-procure-83-indigenously-developed-lca-tejas-for-the-iaf/indigenous-content/slideshow/80282493. cms

② G. Raj Narayan，“Indigenisation：The Only Way Forward，” *Indian Defence Review*，May 29，2015. http：//www. indiandefencereview. com/indigenisation-the-only-way-forward/

③ “Look East，Link West，Says PM Modi at Make in India Launch，” *Hindustan Times*，September 25，2014. https：//www. hindustantimes. com/business/look-east-link-west-says-pm-modi-at-make-in-india-launch/story-mGj6f6mlUmos0BAi27Rl1O. html

④ Iyer Anandi，“Moving from Industry 2.0 to Industry 4.0：A Case Study from India on Leapfrogging in Smart Manufacturing，” *Procedia Manufacturing*，No. 21，2018，pp. 663-670.

⑤ “Defense Acquisition Procedure，” Make in India. https：//www. makeinindia. com/defense-acquisition-procedure

⑥ “Defense Industrial Corridors India，” Make in India. https：//www. makeinindia. com/defence-industrial-corridors-india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N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N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在此阶段，印度与俄罗斯的合作已从过去的“俄卖印买”到“俄卖印仿”逐步转向“平等合作、共同研发”的新模式。与美国联合开发士兵生化战防护技术和军用通信设备，并积极探讨喷气发动机和航母技术方面的合作；与法国在联合研制、技术转让以及高技术武器销售等方面已经建立了较为稳固的合作关系；印度斯坦造船厂与韩国现代重工集团建立合作以联合建造军用舰船。[①] 在政策导向上，印度不断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国外大型军工企业来印投资、合作、参与印度国防工业建设。DAP允许国防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100%，而之前这个比例仅为26%。DAP展现出莫迪正试图摆脱印度军事力量过度依赖进口的局面，通过大力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将印度建成军工大国的决心。[②]

在2020年新颁布的《国防采购程序》中，印度还首次将武器租赁列为除采购和生产外获取军备的重要途径，这是印度国防工业发展的新思路和新突破，大大节省了国家购买军备和技术所需的高昂费用，便于将更多资源投入军备自主研发，进而提升武器国产化和自主化水平。[③]

（三）印度领导人执政风格差异

辛格总理来自印度国大党。印度获得独立之后，国大党长期执政，致力于建设一个国际化、现代化的印度，认为军事力量是塑造印度大国地位的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式，应该大力扩充国防力量，凭借持续加大海外军购快速增强印度军事实力。这既体现了国大党的军事理念，也突出了国大党的竞选承诺——确立印度强国地位。为贯彻印度的“强国梦想”、确立印度在南亚的大国地位、提升人民自信，国大党大幅度增加国防费用，加大军备发展力度，持续增加军费开支和军购费用，并且尽可能研制和采购更多武器系统。

辛格为人低调，性格温和，经济学家的职业背景塑造了他务实的处事风格和行为偏好，[④] 鲜有激进言论，任期内受到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和拥

① 董磊：《洞朗事件后解读印度的军事和国防实力》，《国防科技工业》，2017年第9期，第68～69页。

② 董磊：《洞朗事件后解读印度的军事和国防实力》，第69页。

③ Ministry of Defence, Government of India, “Defense Acquisition Procedure,” p. 5. https://www.mod.gov.in/sites/default/files/DAP2030new.pdf

④ Uppal Nishant, *Narcissus or Machiavelli? Learning Leadership from Indian Prime Ministers* (Milton: Taylor and Francis, 2021), pp. 141-157.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N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H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护。[①] 在外交方面，辛格采取“务实外交”，[②] 外交风格有着明显的“实用主义”，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和大国的关系，发展多方位外交，甚至努力改善与素来不睦的邻国巴基斯坦的关系。经辛格政府的努力，印巴两国享得一段较长的和平时期。[③] 辛格政府时期的印度军购政策最为重要的标签就是“务实”，辛格从印度的切实需要出发使得印度军购费用大幅增长。

莫迪来自印度人民党（BJP）。BJP 成立于 1980 年，前身是 1951 年成立的印度人民同盟。印度人民党的竞选纲领明确提到军事安全在针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等综合性国家安全政策中的重要地位，并强调要改革国家安全委员会，促进国防生产，采取一套综合性的国防措施和政策，还提到要建立一套独立的战略核计划。[④] 印度人民党在国防政策与策略上持强势姿态，并且更加注重独立自主。莫迪自上台后专注于印度经济发展，大力发展军力，努力提高大国地位，实现政治强国梦想。在印人党领导下的联合政府用在军购上的开支在不断紧缩，将更多的军费投入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等方面，并开展了新一轮军队改革。

莫迪是一位性格坚韧的政治家，其成长环境和从政经历赋予了其强势的行事风格，对于矛盾和冲突的解决一般会采取比较强硬的手段。[⑤] 此外，莫迪对于带领印度走向富强充满信心，其声称要带领印度发展成为“全球领导大国”（a leading power），而不只是一支制衡力量（a balancing power）。[⑥] 强人风格和有雄心的政治理想使得莫迪做事雷厉风行，以强有力的姿态保

① 屈从文：《曼莫汉·辛格：印度第一位锡克教总理》，《领导科学》，2004 年第 14 期，第 41 页。

② 伍福佐：《论印度辛格政府的务实外交》，《南亚研究季刊》，2010 年第 1 期，第 28～33 页。

③ 刘虎：《国大党执政周年：回顾与省思》，《南风窗》，2005 年第 12 期，第 83 页。

④ 陈继东：《印度大选与新政府的政策走向》，《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6 期，第 152 页。

⑤ Ajit Phadnis and Aman Kashyap，“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Personalities：Textual Analysis of Speeches by the Indian Prime Minister，” Working Paper at 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Indore，2019，pp. 16-17. https：//www. iimidr. ac. in/wp-content/uploads/WP022018-19HSS. pdf

⑥ 郑瑞祥主编：《印度的崛起与中印关系》，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 年版，第 231～242 页。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H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N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证印度的稳定和发展。[①] 因此，面对印度国防实力和自主性均不尽人意的现状，莫迪敢于下令改革国防采购手续，缩减进口军备数量，推进国防本土化进程，加快自主研发与国际合作，并简化国防采购流程。

总而言之，辛格所在的国大党希望通过扩充国防力量以提升印度的国际影响力，因此不断加大外购武器资金投入；而莫迪政府则更注重提升国防工业自主性，减少对军购的依赖，因而缩减军购规模，转而投资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

印度政府和军队长期以来存在官僚腐败，两任总理处理腐败问题的不同态度和方式也对其任内军购行为差异产生影响。据世界腐败研究机构“透明国际”（Transparent International）数据显示，辛格政府时期印度的全球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保持在 2.8～3.6，属于严重腐败的国家，印度在“最清廉—最腐败”国家排列次序的排名在这一时期大部分稳定在 85～95 之间，处于中下游水平。尤其是辛格第二任期，印度的腐败更为严重，排名进一步走低（见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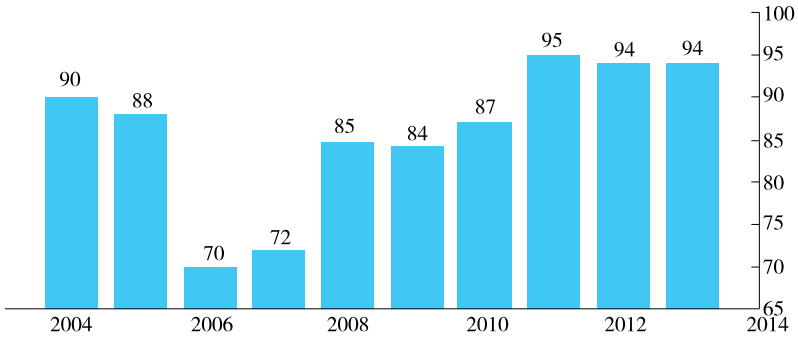


图 5　辛格政府时期印度清廉程度世界排名

资料来源：“India Corruption Rank,” Trading Economics.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india/corruption-rank

2013 年，印度曝出一起性质恶劣的军购腐败案件。在此案中，印度官员涉嫌接受意大利国防和航天公司的贿赂，签订了价值 7.5 亿美元的 12 架 AW-

① “Remarks by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at the Launch of the Book ‘The Modi Doctrine’ at IIC, New Delhi,” August 13, 2016,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7314/Rema; Ashley J. Tellis, “Narendra Modi and US-India Relations,” in Bibek Debroy, Anirban Ganguly and Kishore Desai eds., *Making of New India: Transformation under Modi Government* (New Delhi: Wisdom Tree, 2018), p. 528.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N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N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101 中型直升机合同。[①] 印度军方相关人员通过接受超一成回扣操纵招标，使价格更低的美国公司失去了中标权，在一定程度上对印度的国际声誉和军队现代化进程造成了负面影响。[②] 而 2013 年正是辛格政府军购数量及占比最大的一年，这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腐败与军购之间似乎呈现正相关的微妙联系。

印度军队的前身是英国殖民者统治印度期间组建的雇佣军，直至今日“金钱至上”的雇佣传统仍影响着印军。面对军队内部的腐败问题，辛格总理并没有采取有效遏制措施。在辛格政府时期，由于其权力受到国大党党魁索尼娅·甘地（Sonia Gandhi）的分流而处于弱势地位，各部门和机构都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部门本位主义超出了总理的控制，导致官僚机构腐败横行、效率低下。军队内部往往为了获取巨额回扣或经费，擅长鼓动政府签下巨额军购订单。因此，在辛格政府时期，腐败的盛行和金钱的驱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印度的军购总额不断增长。

2014 年莫迪就任总理后率先打出“反腐牌”，接连推出一系列反腐措施，坚决切断因裙带关系而盘根错节的贪腐恶习，这也是莫迪竞选时的承诺。莫迪表示印度摆脱腐败要自上而下，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据“透明国际”数据，这一时期印度在世界排名上升至第 80 位左右，最高时位列第 76 名，相对于辛格时期清廉程度有了明显提高（见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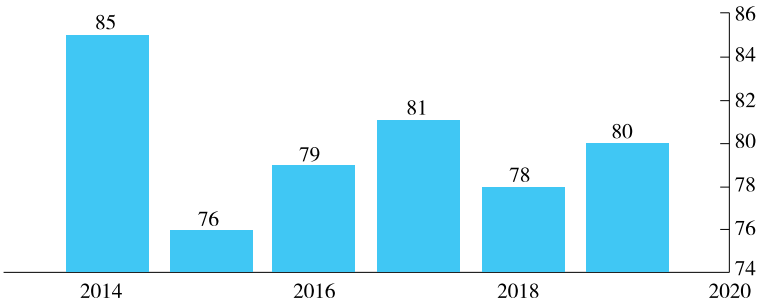


图 6　莫迪政府时期印度清廉程度世界排名

资料来源：“India Corruption Rank,” Trading Economics.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india/corruption-rank

① Corruption Tracker, https://corruption-tracker.org/case/the-indian-vvip-helicopter-deal; “Finmeccanica Helicopter Deal Payments Frozen by India,” BBC News, February 14, 2013. https://www.bbc.co.uk/news/world-asia-india-21464110

② “Helicopter Bribe Scandal Threatens India's Defense Modernization,”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5, 2013.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helicopter-bribe-scandal-threatens-indias-defense-modernization/2013/02/15/05e70f76-775a-11e2-b102-948929030e64_story.html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N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N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莫迪的重拳反腐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印度政府和军队内部的贪腐之风，尤其是通过简化采购程序和对军工企业进行改革，有效降低了军购滋生腐败的可能性。在失去利益驱动的情况下，印度官员鼓动军购采买的意愿显著下降，这也是促使莫迪政府第一任期印度军购数量逐渐走低的原因之一。

三、国际形势变化对印度军购行为的影响

从辛格政府到莫迪政府第一任期的十几年间，印度军购的结构和内容发生了明显改变，俄罗斯和美国在印度军购中的占比出现了明显的消长，这与不断变化的国际局势存在密切联系。

（一）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对印度的影响

在2004年至2013年的辛格政府时期，全球权力重心从大西洋转向亚太地区，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其经济总量综合起来占世界的比重接近40%。[①] 亚太地缘政治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新的权力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基于对自身发展环境以及亚太地区形势与权力格局的判断，印度开始积极拥抱亚太，将亚太地区置于对外战略的优先方向。为此，辛格政府积极开展以印度为中心、大国外交为重点、周边外交为基础的全方位外交，以求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提升自身国际地位。于是，印度以军购需求与订单诱惑为筹码，开始积极拓展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世界大国的关系。

首先，辛格政府积极加强与俄罗斯的密切联系，继续维持两国传统军购伙伴关系。印度持续向俄罗斯订购大批军备，且力度不断上升。辛格在任的十年间，印度共向俄罗斯购买了超过200亿美元的军备，[②] 这不仅体现了印度对俄罗斯的信任，同时也为俄罗斯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从而助力印度巩固与俄罗斯的战略友好关系。

其次，印度对美印关系的发展进行重新定位，印美关系的发展成为印度大国关系的首要关注。[③] 自2006年起，印度每年都进口美国军备，尤其自2009年后辛格政府第二任期内印度对美国的军购额度迅猛增长，从第一

① World Bank Database.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

② 参见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相关数据。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

③ 郑瑞祥：《印度大选及新政府政策走向》，《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5期，第44页。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N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N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任期的1.8亿美元上升至近13.8亿美元。[①] 印度通过与美国加强国防科技合作和武器贸易往来，提升了印军装备现代化水平和作战能力，大大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

最后，印度寻求在国际上“广结善缘”。印度已经成功地与欧盟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双方领导人之间也存在频繁的互访。印度广泛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往来关系，以便获得这些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对自己的支持，期待能在申请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上得到助力。因此，辛格政府增加对欧洲国家的军购。

2014年莫迪总理上任时正值美国奥巴马政府以“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战略应对中国崛起。到2017年特朗普主政白宫掀起“中美贸易战”后，中美两国战略竞争态势愈发明显。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先后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2018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和美国的主要威胁，指出要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②] 美国随即出台“印太战略”，在印太地区通过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综合手段遏制中国，以维持和巩固美国的霸主地位。[③] 2021年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继续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称中国正日益成为一个竞争者并在多个领域挑战美国，因此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和印太战略多有延续。[④] 印太地区越来越成为大国竞争的主要舞台，印度洋及印度次大陆国家在整个地区的重要性显著加强。

莫迪上台后对“印太”概念颇为重视，且出于制衡中国的考量，逐渐向美国靠近。印度的政治期许和外交动向是寻求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平衡，从而扩大自己的发展空间。因此，“印俄”、“印美”两对关系的发展变化影响着印度的军购行为，促使印度的军购来源多元化、均衡化，并且更倾向于高精尖武器。

一方面，印度正在尝试降低对俄罗斯军购的依赖。莫迪政府重新审视

① 参见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相关数据。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

② John M. Weaver, “The 2017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Strategic Security*, Vol. 11, Issue 1, 2018, pp. 62-71.

③ 王巧荣：《中美竞争加深将如何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人民论坛》，2020年第16期，第35页。

④ 韦宗友：《拜登政府“印太战略”及其对亚太秩序的影响》，《当代美国评论》，2022年第6期，第46页。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N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N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了俄罗斯的战略地位，俄罗斯在印度的整体外交布局中地位有所下降。面对国内经济增长的需要，印度必须寻找贸易伙伴，扩大对外出口，争取更大的经济效益，这一点在俄罗斯身上较难实现。同时，俄罗斯因克里米亚危机遭到西方世界的围堵制裁，而印度希望与西方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并不希望受俄罗斯的“牵连”。加之近年来由于引入的俄制武器成本高、高科技装备拖延交付、俄制武器频发事故等原因，印度军方对俄罗斯似有微词。出于国内外现实政治、经济、安全利益的考量，印度逐步减少对俄罗斯的军备进口。

另一方面，印度不断增加对美国的军购数量。印度调整了美国在印度外交布局中的优先次序，在安全上愈发趋向美国。美国抛出的“印太战略”构想与莫迪政府在印太地区的利益考量相契合，双方有了利益诉求的交汇点。伴随美国日渐加大对印度的拉拢力度，印度进口美国军备数量大幅提升，印美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在逐步强化，美式武器的引入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印度防务装备的更新换代，提高了印军的装备水平和作战能力，符合印度军购根本目标。

总体而言，印度军购中的“疏俄亲美”变化既是国际风云变幻的背景下印度将军购作为外交工具使用所导致的，也是印度不断寻求满足自身军力发展诉求的结果。

（二）俄乌冲突对未来印度军购的可能影响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聚结在一起对俄罗斯实行制裁。尤其是美国支持乌克兰当局并向其提供大量武器，令俄乌冲突实质上变为美国以乌克兰为代理人与俄罗斯进行的一场代理人战争。[①]而且美国利用俄乌冲突的“蝴蝶效应”，逐步将欧洲地区的“反俄同盟”扩展为印太地区的“反华同盟”[②]。俄乌冲突对当前国际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加剧了国家尤其是大国间剑拔弩张的紧张态势，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增加。这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印度自身的战略考量，进一步巩固了印度在军购上“疏俄亲美”的趋势。

第一，印度出于对大国地位和国防自主的追求，已有逐渐降低对俄军备依赖的意愿。在俄乌冲突中，俄军及俄式装备在实战中的表现给印度带

① 夏立平：《俄乌冲突如何影响中美俄三边关系》，《世界知识》，2022年第11期，第55页。

② 巴殿君、吴昊、廉晓梅、王彦军、王箫轲：《“俄乌冲突与东北亚地区政治经济形势新变化”笔谈》，《东北亚论坛》，2022年第4期，第5页。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N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N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来了巨大冲击，“俄军坦克在乌克兰遭受的惨败，让印军必须重新考虑未来的建军思路”[①]。并且，印度认为在俄乌冲突后中俄关系将更加紧密，这可能对印度不利，印度必须加快降低甚至摆脱对俄罗斯军备的依赖。鉴于俄军装备的质量问题和技术问题，以及自主发展军备力量的需要，印度向俄罗斯的军购已逐渐减少，并且将持续减少。

第二，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及其盟友拉拢印度，意图让印度倒向美欧阵营，共同谴责俄罗斯。虽然印度对此保持“中立”，没有明确表态，但是印太战略下印度与美国愈走愈近是事实。美印双边合作尤其是军事领域合作不断加强深入。印度持续提升美式装备进口，与美国开展防务合作和联合军演，提高双方军事上的实操性。例如，美印双方于 2022 年 10 月中旬在印度北阿坎德邦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借势在中印边境挑衅，在地区内展示对华强硬姿态。当前美印联合制衡中国的企图短期内不会改变，因此印度在军购上向美国倾斜的势头也不会削弱。

第三，俄乌冲突为印欧关系加强带来新的契机。2022 年 4 月英国首相约翰逊访印，5 月莫迪访问德国和法国并出席第二届印度—北欧峰会。欧洲国家同美国步调一致，希望拉拢印度对抗俄罗斯威胁，愿意向印度提供先进武器装备和技术，帮助印度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②] 面对欧洲国家的示好，印度借机谋求自身的战略利益。对印度而言，这是推进自身军购多元化的机会，同时也可在防务合作中争取更多回旋空间。

四、印度军购行为变化的效果和影响

印度军购行为的变化是内生驱动因素和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同时，印度军购行为的变化又会对其国防建设和外交布局产生深远影响。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讲，印度军购行为变化的原因与其效果和影响相互作用，呈现因果转换的发展态势。

（一）影响印度国防工业建设和军队战斗力

从辛格政府到莫迪政府，印度军购逐步转型。莫迪政府在军购上重“质”不重“量”，军购整体规模缩减，意在推动印度国防工业本土化发展。而莫迪的新国防工业政策确实取得了良好效果，印度的武器研发水平和制

① 王明：《俄乌战争对印度的地缘影响》，《坦克装甲车辆》，2022 年第 10 期，第 42 页。

② 刘宗义：《印欧关系何以走向“新高点”》，《世界知识》，2022 年第 11 期，第 32～33 页。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N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N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造能力有了明显提高。在2017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全球军工百强排行榜中，印度有四家公司入围，[①] 这证明印度坚持合作创新和推动国防工业发展转型取得了显著成绩。由此，莫迪政府的军购数量大幅减少便不足为奇。

莫迪政府第一任期内，印度军购来源国多元化，增加对美国、以色列和法国军购所占比重，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这对印度军事发展有积极意义。首先，印军能够接触到更多西方的先进作战理念，提高印度武器装备的自动化和信息化水平；其次，减少对俄罗斯武器装备单一依赖带来的脆弱性，降低由此可能产生的政治和外交上的捆绑和风险，并在对俄军购中占据更多主动。但在单一作战平台兼容使用多源武器系统，这给作战指挥带来更大难度和挑战，不利于战斗力的提高。

从长远来看，印度欲确定世界强国地位，不可能长期依赖武器进口，走自力更生的武器国产化道路是必然趋势。只要下定决心发展国防科技，印度军工企业完全有可能实现摆脱外部依赖，整合各种武器系统，将其内化吸收为自身军备研发生产能力。[②]

（二）影响印度外交布局和发展环境

作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军火买家，印度在国际武器市场上自然颇受军售国家青睐，印度借此开展对外交往。辛格执政时期，印度通过军购手段，拉拢俄罗斯、向美国示好、与所有友好国家（包括法国、以色列、俄罗斯、美国和英国等主要防御伙伴）迅速加强双边关系。[③] 这为印度打开外交格局，拓展并深化与周边地区大国的良好关系，帮助印度赢得相对和谐稳定的外部环境，使包容性经济发展和减贫的国内任务能够快速、无障碍地取得进展。[④]

莫迪政府第一任期内中美战略竞争愈加激烈，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安全问题成为印度的主要议题。莫迪政府减少对俄罗斯的军备依赖，增加向

① 王睿、彭玲霞：《从全球军工百强看世界军品生产发展态势》，《国防科技工业》，2019年第2期，第41～43页。

② 李张兵、龚泗琪：《冷战后印度国防军购战略探析》，《人民论坛》，2013年第26期，第255页。

③ Ministry of Defence, Government of India, "Annual Report 2006-2007," p. 32. https://www.mod.gov.in/sites/default/files/MOD-English2007_0.pdf

④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Annual Report 2008-2009," p. 5. https://mea.gov.in/Uploads/PublicationDocs/170_Annual-Report-2008-2009.pdf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N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P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美国的军备进口，这契合印度的“平衡外交”。印度追求战略平衡，一方面可避免受俄罗斯在外交事务上的连累，另一方面可携手美国共同制衡中国崛起。

当前美印军事防务合作逐步深化，美国积极肯定印度在南亚和印度洋区域的领导地位，并在美国的全球与区域战略中给予印度重要角色与地位安排。这有利于印度凭借与美国的深度合作提升自身在地区的实力和影响力，树立大国形象；同时，印度可借助美国庞大的同盟体系，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与一些东南亚国家互通友好，以此扩大印度的国际市场版图。

虽然莫迪政府减少对俄罗斯军备进口，但是俄罗斯对于印度来说仍是要争取的战略伙伴。因此印度虽貌似在军购上“疏远”俄罗斯，但在关于双边贸易、文化交流等方面依然秉持积极态度。俄乌冲突爆发后，印度在美俄间“骑墙”，没有跟随美国向俄罗斯施压，反而加大与俄罗斯的能源贸易往来，向俄罗斯购买了大量石油。由此可见，印度在世界大国间左右逢源，为自身寻求最大的发展空间。

结　语

分析 2004 年至 2019 年辛格政府时期与莫迪政府第一任期内印度的军购，可以看出印度军购数量、内容、费用和来源国均发生明显变化。其中，莫迪政府的军购最为明显的变化呈现如下特点：一是军购费用在军费总体开支中所占比例下降；二是用于飞机、防空系统和导弹的军购费用开支明显上升；三是军购来源国中俄罗斯比重下降，美国、以色列和法国所占比重上升。

莫迪政府倡导的“国防自主化发展战略”是造成印度军购行为发生变化的首要原因。军购被视为是提升国防实力最直接且最迅速的方式，是辛格政府倚重的国防发展重要路径之一，这使得军购支出在军费开支中的总占比逐年攀升，并在 2013 年其卸任之际达到峰值。然而长期大规模军购形成的路径依赖势必造成国防产业自主生产能力下降，对外依赖性强，存在被“卡脖子”的风险。在“国防自主化”发展理念的指导下，莫迪政府将更多的军费倾斜至武器装备的自主研发和生产，同时军购来源和内容被进一步优化。在印度军费增加的大背景下，莫迪执政期间呈现出军购费用减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P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N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少且占军费比例下降的局面。

从国际环境影响国家发展目标的层面看，国家发展目标规范着印度的军购部署与行为。辛格执政时期正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时期，世界朝着多极化趋势发展。印度作为经济稳健发展的新兴大国，建设成为 21 世纪世界强国的愿望更加强烈，并通过增加海外军购加紧扩充国防军事力量，提升国家安全。至莫迪第一任期，印度经历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战略调整，印度之于美国的战略地位被大大提升。伴随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有意提升印度的战略地位，制衡中国崛起，这与印度实现政治大国理想和在亚太拓展政治影响力的理念不谋而合。体现在军购上，就是加快降低对俄罗斯武器装备的严重依赖，开始向有共同利益诉求的美国靠近。印度以军购作为调整国家间关系的外交工具，在美俄之间积极开展平衡外交，为自身发展争取最大空间。俄乌冲突实质是一场代理人战争，俄罗斯的交战对象实为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约支持下的乌克兰，是一场俄式武器与美式武器之争。印度长时间、大规模购置俄罗斯的武器装备，已经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武器体系，其战斗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些俄制装备的影响。同时，由于武器装备是特定军事思想和理念的物化，军购来源多元化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小觑。即使印度在俄乌冲突之后在军购问题上转为“疏俄亲美”，其依然会在提升战斗力上面临严峻挑战。印度武器装备发展正在经历本土自主与外部引进平衡、俄系装备与多系统兼容协调，这将是一个艰难、长期、甚至是内耗的过程。

（编　辑　毛　悦）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N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H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Reasons for Changes in Indian Arms Procurement: From Singh Government to Modi Government

By Zheng Hua, Ren Shanshan & Zhang Diyun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issue related to the military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 arms procurement (AP) directly affects national defense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powerful country in South Asia, India has always considered AP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approaches to enhance its military power and realize its dream of political power. During the fifteen years from 2004 to 2019, India's AP has shown a significant downward trend against the rising economic power, increasing security threats, and stronger willingness of leaders to achieve political greatnes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is change from three dimensions as India's defense strategy,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over the past fifteen years and finds that such factors as the localization philosophy of India's military industry, the quantity and content of arms from source countries, the philosophy of the ruling party, and the administrative style of the leaders have at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dia's national defense autonomy, the corruption of bureaucratic institution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This 15-years period has also experienced the rise of the BRICS, as well as the transition from Obama's Asia 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 to Trump's Indo-Pacific Strategy. Along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Modi government's initial intention to expand India's political influence is consistent with the U. S' attempt to use India as a counterweight to balance China's rise.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India's determination to use AP as a diplomatic tool is increasingly clear.

KEY WORDS: India; Arms Procurement; Manmohan Singh Government; Modi Government; 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dia-U. S. Defense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Foundational Interests, Development of Mechanisms, and Future Trends

By Tao Liang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and trends in India-U. S. defense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have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th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H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